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2

序 言

记得是四年前的事了，我在博士研究生考场上第一次见到自然、温和的李楠。那时，她笔试的成绩居于前两名，口试排在佳位，知道肯定会取她的了。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多年来在海派研究中留下的一个缺憾，一件心事，就是对上海小报的研究，竟然是由她来完成的。转眼间她要出版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了，并由我来作序，我的愉悦可想而知。

近年来，我招的是“京海派研究”的学生。李楠过去对海派知之不多，她做硕士生读的是哲学。刚回到她真正热爱的文学专业来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些年的长足进步，不免叫她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她很有悟性，知道海派研究还缺少一个无人光顾的角落，知道海派研究必然通向小报。我们师生开始频繁地讨论起这个小报的题目。我自己研究海派的经验，是由单行本而接触张资平、施蛰存、穆时英的。特别是施蛰存的短篇集子一本本读下来，吃惊于它们每篇都在水平线之上。1981年为《十月》写文章介绍施蛰存，就起源于这种阅读体验。由施蛰存而及他主编的《现代》，由期刊而发现令狐彗（董鼎山）、

东吴女作家施济美等(当时不叫这个名字)以及予且。予且在四十年代《杂志》上一期期打头发表的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而樊骏的回忆坚定了我的发现,他中学时就经常读到令狐彗和予且的作品,证明是当时上海的流行作家。再下来,经过张爱玲知小报不可憎。我对童年上海街头的小报尚有印象,因幼时大人不让看小报(像我父亲的家庭从来不带孩子去逛“大世界”游艺场。小报便等于“大世界”),以为是末流。在首都图书馆看过几种沪地小报,包括花报,其时,首图所在的国子监院内经常传来当年的流行歌曲《军港之夜》,小报的驳杂浑浊被苏小明的抒情所冲淡,仅留下了都市温暖。但小报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海派是什么关系?与都市文化、市民文化是什么关系?我没有可能拿出一两年的时间去坐图书馆的冷板凳。这令我想起唐 先生在一次讲演中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话来。他的意思是说研究要从真正读原始资料做起,下工夫占有材料,论从史出,同时融进中外文化的新见。这是做研究的正路。假如仅仅依靠一个外国理论的框子,或者拼凑一个自设的理论框子,到中国现代文学里面去寻找有用的材料,这就已经有了问题。而这几年,更兴起一种拼拼凑凑写论文的方法(计算机的应用给这种方法提供了条件),甚至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段,写后连是否抄袭了别人都弄不清楚。这样下去,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便日益降低了。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当李楠决心做这个填补学术空白的课题时,我心里是高兴的,但也替她担心。我估计,除了在上海读报的生活安排繁难、一年左右的孤寂之外,她还有三难。第一,理解上海之难。她不熟悉上海,不懂上海话,不了解上海民俗及市民日常生活状态,她如何切入上海?第二,掌握、梳理、钩沉小报资料之

难。原来以为小报只有二三百种,谁知竟有一千多种,真正是浩如烟海,扎进去一头雾水。而现代文学资料工作的薄弱,本来就是我们这个专业与古典文学专业、历史专业的差距。现在的学生对于抄卡片、记札记,该抄哪些,不抄哪些,往往训练不够,而大量复印的话成本又十分昂贵。第三,从头掌握中外市民社会理论之难。上海市民社会与北京,与伦敦、巴黎的市民社会是否一回事?后现代的一大堆大众文化理论,是否适用于理解晚清民国的中国市民文化?这些无疑都是李楠面前的拦路虎。

半年后,我在上海看到李楠的学习情景,真正地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那是我去参加一次有关胡风的学术会议的时候。我看到她在华东师大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安营扎寨,当起了“上海市民”。骑一辆旧的自行车,每日里往来于上海图书馆与租房之间。我也去了一次上图,看到那里的馆员都与她熟稔了。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到南京路、淮海路踏访,专门去看了大光明电影院与百乐门舞厅的旧建筑。在大光明背后的黄河路(派克路),经过热心的里弄阿姨的帮助,进一家后门去看什么叫(石库门)亭子间。那几日,淮海路下着微雨,从书店跑出来抱着新买的一大抱书,又怕淋了身子又怕淋了书。总之,李楠即使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融进了上海的现实生活。她的眉宇间流露出对上海今天与昨天的兴致。她通过熟悉与热爱上海,打破了树在她面前的历史的障壁。她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与研究对象发生共鸣(并不是所有内地城市的人都能这样),从而产生了解它的迫切欲望,生出了毅力与决心。那些困难就这样被她克服,迎刃而解了。

现在,她的努力已经化成摆在我面前的二十几万字的论文,加上索引,厚厚的一册。这中间凝结着她的心血。她把在京的

地下室的住房戏称为半月居,写下这段岁月给她留下的全部感情,这是稍微读一下本书的《后记》便能扑面感受到的。

小报的研究至少第一次经了她的手,系统地、完整地梳理了五十多年间的基本资料,由此升入了一个初步的学术台阶。如果细说,首先是给小报下了定义,做了历史分期,描述了基本演变、基本特征、代表性报纸、代表性报人的情况。据说,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里海外学人看小报的很多,大都是带着已成的题目捞材料的。这里的做法不同。其次是给小报以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定位。认为上海小报是中下市民的文化读物,发现它前后经历了晚清暴露和狭邪文化、民国鸳蝴文化与海派通俗文化三个时期,这正是现代中国市民文化的三种成分。其中对海派与鸳蝴关系这一难题,从小报角度加以全新的解释。在小报上,鸳蝴与海派分得清清楚楚,小报中鸳蝴“控制”时间最长,那种偏旧的、日常生活的、饮食男女的通俗文体是典型的鸳蝴。待到新感觉派出现,在小报反遭遇批评。直至四十年代,才与海派的通俗一派并存。有人说施蛰存曾有施青萍时期,因而“证明”海派来自于鸳蝴,但叶圣陶、张天翼也有《礼拜六》和《半月》的时期,难道就说鸳蝴能产生五四写实和三十年代左翼吗?再次,本书从一个新的侧面深入上海这个城市的肌里。上海被美化得太多,被歪曲得也太多了。上海的真面目究竟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什么?李楠从“流言”剖析它由名人构成的真实的想像图景,从“衣食住行”分析它的物质性、商业性,从“欲望释放”来指出它对人的解放与堕落的作用,相悖而又相交的多重意义。世界上的事情,多重性是真实的影像,从两端到中间,有许多中间的颜色,就如人性有从兽至人至神的复杂含义。上海还有色情的一面,当

然并非全体。小报是民间的东西,在民间文化之中从来就有猥亵的成分。上海不是一个平面的都市,仅从小报的切入便够让人目眩。另外,她当然还研究了小报中的文学,指出通俗大众文学中的小报文学另有自己的与纯文学基本精神相通而不尽相同的评价标准。指出小报文人作为大众文化人的品格的逐步形成过程。她提出了目前方兴未艾的报刊研究,也是另有研究方法、途径可寻。那便是综合的版面块状结构,抓住编者、作者、读者三者生动流程而进行的观察方法与研究方法。这样,她试图还小报以本来的面目,将一种在上一世纪的都市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读物(上海是一典型)推到了我们面前。

李楠以上海小报研究的论文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评议与答辩时黄修己、陆耀东诸先生都给予好评。而范伯群先生也多次给她鼓励和具体指导。我认为研究生的论文应当站在学术前沿,不应降低对它的基本要求。王瑶先生谈硕士论文就说,应做到后边的人再做此题目必不能绕开你的程度,便指的是这种要求。所谓“学术前沿”大致又分两类:一类是开垦学术处女地,进入前人从未进入的领域,一类是在已有的领域内寻找出新的生长空间。一般说的“填补学术空白”往往指第一类,其实第二类也是某种填补空白,只是更难一些,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更高一些。研究生学习期间一般更适宜第一类的文章,它要有学术眼光,要有披荆斩棘的勇气,要能吃苦。李楠的论文便属这类。

经过这段上海小报研究、训练,李楠的踏实勤奋有韧性,从材料出发思考中国现代市民社会文化问题的学术个性,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如今,她摆脱一切干扰,毅然决定以北平小报的题目申请北师大文学院博士后,得到批准。很多人认为这样下去

个人牺牲太多,但她很有主意,经过这段上海小报的研究经历,她以京海小报材料与理论打下自己坚实的学术基础,在京海派研究、现代报刊研究、通俗文学研究、市民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各个方面展开自己的学术前景。大规模地培养研究生从1978年开始已经历时近三十年,最近几年随着“扩招”,招生日多,而学术水平下降,学术泡沫的发生已是不争的事实。应当怎样面对我们的学术,这是我在作这篇短序时同时思考的问题。李楠的路还很长,她的学术品格和基本功方面不是没有缺陷。她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而是还需用力、再用力。我对她寄予厚望。

吴福辉

2005年4月17日

草于协和医院病房

绪 论

本书所要直面的上海小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长期以来,由于上海小报一直被指认为旧时代低级恶俗的读物,而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无人问津。当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的时候,也曾引起不少人的质疑:研究这些趣味低下的小报,究竟有何意义?在没有去上海图书馆集中阅读小报之前,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顾虑,但当我披览过一百多种小报,并对小报整体概貌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体悟到,小报是市民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存在,不是“低下”两字就能说尽的。以“世俗”见长的小报最能体现城市的风土民情。小报中充斥着市民的起居、生活情趣、风俗习惯、人际交流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庸常内容,却正是城市风貌的底色,最具生命的活力。因此,要考察中国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衍变历程,小报是重要的“活化石”之一。要认识现代通俗文学,要认识中国都市文学,要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质,小报能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看到中下层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的独特图景。如果不了解这个层面,是

无法获得对现代文学、通俗文学、都市和都市文学的完整把握的。

我选择上海小报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初动因,来自于深化海派文学研究的学术目的。海派文学研究自八十年代初浮出历史地表之后,至今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吴福辉 1982 年 6 月在《十月》登载《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一文,发海派文学研究的先声。严家炎在这一年发表于上海《小说界》的系列文章和 1985 年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序言》中,确立了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现代主义流派的地位。从此,海派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自八十年代的局部研究,到九十年代以来的整体思考,海派文学研究推出的一系列厚重的成果促使其走向了成熟,进而成为一门显学。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一次从都市文化的角度把一向处于分散状态的海派诸作家聚集在一起,综合性地论述了在海派作家的人格及其文学活动和创作文本上所显示出的海派文化的特征”^①。从城市历史和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切入,辨析海派成因,给海派文学一个中肯的界定,初步把具有先锋性质的海派文学与非先锋性质的鸳鸯文学、非商业性质的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区别开来。杨义在京海派文化比较研究中,发掘海派作为一个流派的文化成因、文化姿态、文化意义和文化趣味,显示出对于流派研究的学术专长,其最大贡献是在海派的溯源上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新观点。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通过整合实物和文本勾勒了上海的文化轮廓,在都市文化、海派作家、海派小说三者之间寻找互动关系。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在探索海派与西方唯美主义的渊源关系方面,在实

证地研究海派电影和海派文学观念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海派的渊源、脉络及审美形态,研究方法各异,但在现代都市文化是形成海派文学的母体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海派的现代性以及海派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成为海派文学研究的亮点,被学者们从各个侧面反复阐释。相对而言,对于海派“恶浊”一面的研究却要薄弱许多。虽然吴福辉早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已经提醒过我们,要从高雅和恶浊两方面把握海派的整体性质,但由于海派的先锋性过于显著,而且海派现代性研究又十分具有当下意义,因此,海派文学通俗性中恶浊的方面就往往被忽视了。事实上,海派文学中除了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徐 等代表作家的经典作品之外,还有大量流行在上海滩各种小报和时髦书刊上的无名作家的无名作品。如果将海派研究等同于海派精英作家作品研究,就无法对海派的整体取得真切的文学史感受,从而陷入研究的误区。因此,深化海派研究就必须回到原初的文学语境中去,就不能绕开曾经存在的上海小报,否则,海派研究就会含有很大的虚拟成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上海小报上。

这样,我带着先入为主的见解步入了上海小报这块领地,但出乎意料的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认识到小报并不是“恶浊”两个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它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而且,我对“海派小报”这个称谓也产生了怀疑,产生“小报是否整个地隶属于海派”的疑问。实际上,上海小报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历经半个多世纪,形成了包括晚清文人、鸳鸯蝴蝶派文人和三四十年代的部分海派文人在内的庞大小报文人群体。从

晚清小报中已经能够嗅到鸳鸯蝴蝶派的气息,民国初期至三十年代前半期的小报是鸳鸯蝴蝶派一统天下,到了三十年代后半期和四十年代,小报的鸳蝴气息虽不如以前那么浓烈,但仍然存在,只是随着鸳蝴本身现代性的加强,报纸才呈现出与海派合龙的趋势。说小报仅仅就是“海派”的小报,显然片面。在小报真实存在的历史现场中,我领悟到鸳鸯蝴蝶派与海派的真正区别;反过来,明白了区分这两者对于理解小报的文化属性有多么重要。

过去,文坛与学界一向为鸳鸯蝴蝶派与海派是否一回事的问题争执不休,至今尚未取得共识。沈从文说:“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②沈从文将鸳蝴派和海派文学通称为“海派”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和时代特点。在那个海派初露它的文学商品性质的时代,找到了海派和鸳蝴派共同的商业竞卖这一点,可能就认为不需要对它们再做条分缕析的深入解剖了。海派和鸳蝴派之所以容易被当成一样“东西”,是因为他们确实也不是壁垒分明,没有一点联系的。他们在商业竞卖、市民情趣、世俗化这些方面相通,发展轨迹也不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时而疏离,时而纠缠,难以剥离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又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因为各自的渊源关系,把握世界的价值标准和内在的心理机制是截然不同的。鸳蝴文化诞生于晚清,与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同步。它是一种新旧杂陈,而以旧为根本的消费型市民文化,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情韵、审美机制及生命力有着夹缠不清的联系,同时它也受

着商业文化生产机制的制约。虽然不断地遭受攻击,但它依然源源不绝地流淌在上海四马路、石库门、旧贵族公馆中“老中国儿女”的日常生活里。在时代的激流洪波面前,鸳鸯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诞生到五十年代初期强行“隐退”为止,鸳鸯文化经历了一个缓慢接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在强调“休闲”、“娱乐”的同时,增添了“民主”、“自由”的教化因素,随着“西化的社会风俗的改变,也不断加入了新的因素”,^③进行现代性的调整。鸳鸯派重要作家包天笑便说,鸳鸯作家的写作动机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④。一句话道破天机,成为解读鸳鸯派精神特质的最佳注脚。如果必须要给鸳鸯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认为把范伯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所作的界定套用在鸳鸯文学身上倒是恰如其分的。鸳鸯文学便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⑤。

与鸳鸯不同的是,海派能够完全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理性地反思传统文化,并揭示出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所产生的新的价值观念,因此,凡是用现代物质精神而不是鸳鸯式的传统情义理的水准去评判世界的作家作品,都应当纳入海派的谱系。吴福辉曾把海派的现代特质归纳为:“第一,它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而在20世纪之初,它特别是把上一世纪末与

本世纪初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学,吸摄进来,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第二,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第三,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⑥在一定意义上,海派文学可分为通俗海派和纯文学海派两个层面。其中,那些只拥有“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和“迎合读书市场”这两种共性,丧失了“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的海派,应当是海派中的通俗文学。而三四十年代与小报纠结在一起的海派,正是海派中的一个支脉——通俗海派。

纯文学海派作家是经过西方现代主义洗礼的上海文化养育出来的,他们的文学生命附着在殖民色彩浓郁的现代社会身上。对于“现代”的敏感,造就了纯文学海派作家反映都市的独特视角,使他们能够触摸到现代文明带给都市人的精神层面的深刻变化。而通俗海派作家虽然也生活在这个喧嚣的空间里,一样呼吸着都市的现代气息,同样感受着物质的压迫,但他们始终停留在直观展露式的书写上,充其量只是描绘了都市风情的平面图景。从小报的角度,他们对海派的态度,则是分门别类,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小报文人便属于通俗海派作家,如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王小逸、冯衡、金小春、唐大郎等,他们是小报的自家人就不必说了。对带着都市白领先锋色彩的“新感觉派”(纯文学海派),小报是拒斥和讥讽的。对富于新市民色彩的张爱玲等(也是纯文学海派),感情是复杂的,既有接纳的成分,也有嘲弄的时候。而张爱玲并不歧视小报,她那封给《力报》主编的信就是对小报态度的告白:“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

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实在是可珍贵的。”“从前我写过一篇涉及小报的文字，想不到得罪了一些敏感的人。但我也没有去解释，懂得的人自然会懂得的。”^⑦而予且、谭惟翰经常在四十年代的小报上发表他们的作品。苏青的短篇小说《鱼水欢》就发在1947年4月6日《力报》创刊号上。潘柳黛讽刺苏青喜欢在小报上发稿时说：“女作家中，写小型报稿子，苏青最有噱头，因为她有‘性’文艺作风。”^⑧小报对纯文学海派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与小报文化内涵的前后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上海小报是近现代上海市民文化流变的表现文本，记录着市民文化产生、衍变的历史过程。近现代上海市民文化由鸳鸯和海派两种文化形态构成。这两条渊源不同的文化之流，从二十年代的泾渭分明，经过三十年代的相互激荡，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至四十年代，它们互相包容，互相渗透，出现并存之势，形成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立体的、多元的市民文化环境。我在真正进入小报“腹地”之后，看清了小报作为中下层市民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市民社会联结的关键所在。

以上这些思考构成了本论文的思维平台，也构成了一种研究视角，一种立场，一条思想线索。本论文将在前人鸳鸯研究和海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于小报文本，对鸳鸯文化和海派文化做一种整合性的文化思考，以期寻找出中国近现代市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都市文化、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我在这里找到了本课题的理论依据，也明白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安排如下：研究小报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以及文化史、文学史、期刊史各角度切入，而本书

只是从文学与文化的综合视角来考察分析的。上海小报浩如烟海,种类繁多,所跨越年代久远,本书依据两年内所阅读的一百零三种小报写出。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千多种小报,那么,你依据一百零三种小报就能概括整个小报的文化、文学面貌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一千多种小报的概念是历史的原生状态,而经过时代的淘洗能够流传和较好保存下来的只不过三百多种。这三百多种里面,许多小报都是稍纵即逝,旋起旋灭的,有的甚至只存活了几天。我所选择的一百零三种小报里包括了寿命较长的和在当时上海市民中较有影响的小报,所以,这一百多种小报是具备上海小报代表资格的。本书既然是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对上海小报进行文化和文学考察,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将必然包括厘清一些基础性的概念,同时阐发一些与文化、文学相关的问题。如什么是小报与上海小报?什么是小报文人?什么是小报文学?小报文人的构成和精神特征是什么?小报文学的基本形态和文学地位如何?小报是一种什么样的市民文化形态?此种文化形态又是如何形成并发生变异的?上海小报是如何对上海市民社会空间进行文学想像的?等等。鉴于以上思考,我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指出小报是现代都市中以消闲趣味为主的、拥有广大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它作为现代市民文化的话语类型和表现文本,经历了早期的鸳蝴文化缓慢的现代演变,后期与通俗海派文化并存的过程,终于成为市民大众的媒体。小报产生的背景是与中国现代都市特别是上海大都会的形成,与现代市民文化的成型同步的。从1897年至1952年止,可分为发轫、定型、衍变、下降等四个发展时期。小报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

社会的控制,经济负担沉重,边缘化的地位也给它带来内外的压力,它的生存策略是以中下市民为接受群体,与大报展开竞争,“补大报之不足”,坚持自己“简便”的、“以小为本”的方针,将色情(所谓“花”)、笔战(所谓“骂”)两相结合,“软”“硬”兼施,走趣味化、民间化、平民化的办报路子。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群:小报文人。小报文人是指称那些站在市民立场上具有市民文化精神的、较深地参与小报运作的人们。大致由晚清文人、鸳蝴文人和后期的部分海派文人构成。晚清小报文人尚存名士风范;鸳蝴小报文人趋俗附利,眼光已由社会转向个体的日常人生,真正走入了市民阶层;海派小报文人是市民通俗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是通俗海派作家。他们共同成为了现代文化断层中的洋场“世俗才子”。小报文人的文化性格是:对主流意识的疏离与趋时共存,“新”“旧”纠缠;落拓文人放浪形骸的行为方式;玩世的审美心态。通过小报文人观察新文学的别样视角,可以探明和解释他们自身的精神空间。他们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对左翼一律同仇敌忾,或随意地亲和海派。他们以新旧兼容的文学和处世标准来衡量新文学文坛,由此可以反观小报文人身上务实与超脱、才子气质与商业习俗、传统操守与现代境遇、外化的道德标准与内在的市民流氓习气这些貌似对峙的品质,如何以奇异的方式混杂,衍生出一个精神“怪胎”来。中篇研究上海小报与上海的关系。小报的文化视境决定了它所阐释的都市是与大报、期刊和新文学迥异的。小报是近现代上海都市的一个“平民公共领域”,是中下层市民世俗化的都市空间。从小报自身衍变来看,它逐渐放弃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向市民文化“投诚”。报纸的内容、版面都呈现平面化展现的

态势,不规避俗语和方言,加强图像化。小报文化品格向中下市民“下移”是读者和编者长时间发生碰撞的结果。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决定了读者趣味的变化,而读者趣味的变化又成为小报品格变化的重要原因。小报拒绝对都市作深度的文化探究和思想润色,仅仅依托市民的生存需求和直观洞察,来营造都市的文化景观。小报营造的文化上海以名人为都市的意象符号,用流言编织都市的叙事历史。小报营造的上海是日常物质的都市,认同市民物化的价值观念,在仿效上层摩登时尚的过程中,尝试建构大众化的现代生活方式。小报营造的都市还立足于市民底层的生存体验,释放不断涌动的欲望,以至于放纵。小报中的上海,是生活在都市市井里的市民的文化想像。下篇讨论的是小报中的文学。“小报文学”是一种通俗的市民大众文学,是一种经过新旧调适的短小的媒体文学。它的总体成就不高,但我们同时要避免过去对市民大众文学与纯文学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衡量的片面性。两者各有特殊的品格,而小报文学的娱乐消遣性、世俗的沟通性和浅显易懂的特征,为纯文学所不能代替。市民大众文学中的上品应该是既能用纯熟的表现手法较好地反映市民生活,取得市民读者的认同,又能在文学现代性上作出一些必要探索的作品。小报作家既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也渐渐有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表现形式的可能。为了保持独立品质,又以所谓“人情习尚”替自己的存在寻找文学根据。“小报小说”由于贴近市场而造成类型化写作。因媒体的连载传播方式,造成非单行本化、片断化、未完成时态和与新闻结缘等特点。小报小说擅长展示娱乐场所的都市风俗画,可称为市井众生的“浮世绘”。从鸳鸯言情小说到四十年代海派通俗小说,小报女